



## 税收大数据成打击偷逃税款利器

## 打造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力的智慧税务

□ 本报记者 蔡若虹

近期,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网络主播薇娅涉嫌偷逃税款,并依法给予了处罚。此前,朱宸慧、林珊珊两名网络主播因涉嫌偷逃税款被罚,背后也有税收大数据的“功劳”。

如今,税收大数据不仅成为打击违法违规纳税人偷逃税款的利器,更凭借对经济运行信息的及时反映,做到站位更高、维度更广、层次更深。”广西壮族自冶区主席蓝天立对税务部门依托税收大数据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表示肯定。

## 聚焦经济运行热点以资党政

“广西税务部门的做法很有启发,值得借鉴。自治区各经济部门要进一步深挖数据价值、深化数据应用,做到站位更高、维度更广、层次更深。”广西壮族自冶区主席蓝天立对税务部门依托税收大数据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表示肯定。

经济冷暖“税”先知。税务部门聚焦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重点、焦点问题,聚焦经济形势变动,按月开展宏

观经济税收分析,增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研判的预见性和敏感性;聚焦政策落实效应,开展“十三五”时期减税降费成效分析,全面系统地反映政策落实效果;聚焦新发展理念,紧跟形势变化,开展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清洁能源、脱贫攻坚等分析,与时俱进打造分析产品。与此同时,各地税务部门主动向需当地党委政府,结合地方特色开展分析。例如,山西省税务局开展煤电企业生产经营分析,上海市税务局开展长三角一体化相关分析,都得到了当地党政领导的充分肯定。

2021年以来,广西税务局编制的广西税收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指标体系,每月初以“文字+指标列表+图表展示”的形式,从经济发展概况、行业发展情况、投资、消费等方面,多维度、多层次、多视角地反映上一个月度广西经济发展总体趋势、亮点及短板,并形成月度税收分析报告上报自治区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有效发挥了以资党政作用。

如何将手中的数据转化为财富和发展动力,更精准地对纳税人需求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税务部门都在积极探索。上海市税务局围绕外资总部企业发展动态,在内开展业务部门间的横向合作,在外与商务委落实跨部门数据联动,纵向与税务总局主管税务部门密切沟通,横向与重点省市税务部门协调配合,撰写了分析报告《引领外商投资大方向打造内外循环新格局》。该报告重点聚焦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和深圳,综合对比六省市外资总部在数量规模、税收贡献、功能

能级等方面的特色亮点和差异,探索建立适合各地参考的外资企业分析数据模板。

## 不断探索“以数治税”新路径

2021年7月,湖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税收指数发布。税收指数显示,2021年上半年湖北经济运行总体实现恢复性增长,复苏态势进一步趋好。

据悉,湖北省政府研究室、省税务局联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综合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税收数据,以2019年为基期,以两年平均增幅为评价基础指标,按照一定权重比例构建了湖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税收指数体系,以企业销售、税收收入衡量经济规模,从市场活跃、产业质效、税收贡献、发展动力、循环融通5个维度评价发展质量。

如今,税收数据在经济运行研判中的“晴雨表”作用日渐凸显。进一步盘活数据资源,挖掘数据价值,拓展数据应用,各地税务部门在不断探索“以数治税”的新路径、新渠道。

“省税务局编制的税电景气指数能较好预测经济发展态势,为我们观察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研判经济发展走势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支撑。”江西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在全省经济运行调度会上说。据悉,江西省税务局2021年6月推出的税电景气指数被省发改委纳入观察经济运行常态化指标库,并写入月(季)度经济运行分析报告,成为党政领导调度经济运行、管理决策的“金钥匙”。

□ 本报记者 王婧

近日,网络平台兴起了一种“搭讪直播”的网络直播方式——主播以各种噱头随机与路人搭讪,并将全过程直播给观众。街头路人一旦被主播的镜头对准,不论是否同意,被搭讪后的真实反应都会被拍摄下来,通过视频直播传播出去,被屏幕前的众多网民“围观”。甚至,在路人明确拒绝的情况下,仍会被主播偷拍,成为直播赚取眼球的“爆点”。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搭讪直播”背后的法律问题也浮现出来——被拍摄“素材”中的个人信息是否受到法律保护?“搭讪直播”如果侵犯到个人权利,谁应该承担责任?在规范“搭讪直播”上,直播平台发布者,有关网络平台、国家监管部门等相关主体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 搭讪直播引不满 吸睛涨粉触红线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进行“搭讪直播”,把路人当做获取流量的“工具”,为自己的平台账号拉流量涨粉丝,这究竟是一种“创新”还是一种“侵权”?

“搭讪直播”行为是一种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这种行为不仅包括了对一般个人信息的收集、传输、公开等,也包括了对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比如个人的地理位置信息、人脸信息等敏感信息的收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新宝对记者表示。

对于“搭讪直播”是否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除外的情形?张新宝认为,“搭讪直播”并不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也不是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而是一种商业炒作行为。因此,收集、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同意,甚至需要作出特别的告知,说明收集、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可能的风险。

浙江大学教授王春晖也认为,该行为为必须依法遵循“告知、知情、同意”的原则。

如果没有相关告知且未取得有关个人的同意,这种情况下的“搭讪直播”,在张新宝看来,属于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

“特别是在个人明确拒绝的前提下,主播仍然采取跟拍或偷拍的方式拍摄,这属于违法行为,涉嫌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在王春晖看来,“搭讪直播”还有可能侵犯被搭讪人的肖像权。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丹林也认为,“如果被搭讪者谈及一些涉及第三人的内容,还可能引发侵犯第三人人格权的纠纷,或导致一些违法犯罪的情形。”

## 网络非法外之地 平台监管需先行

关于处理个人信息的原则,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中均有明确规定,要求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同意,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围观”网络狂欢不该也不能殃及无辜路人。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传播法研究中心主任彭桂兵提示,作为直播平台的主播,要尊重他人隐私、遵守公序良俗,推动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

早在2016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要求,不得利用直播从事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

## 网络直播平台亟待制定规则加强自治

「搭讪直播」兴起 凸显个人信息权利保护风险

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虽然有些短视频平台有相关提醒“如未经过被拍摄主体的明确同意,可能涉嫌侵权”,或者有的平台对户外直播行为的管理规定中,明文规定了严禁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对路人进行言语、肢体骚扰等行为,但是在流量的驱动下,“搭讪直播”的乱象仍堂而皇之地存在于各大社交平台。

“对于这种商业性质的‘搭讪直播’,平台应当进行治理,严厉打击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同时,各信息主管部门可以主动对全网进行整顿,特别对那些具有直播功能的大型平台。”张新宝说。

不能任由“搭讪直播”中的不良信息和违法信息在网络平台上传播。王春晖为此建议,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黑名单管理制度,对纳入黑名单的互联网直播发布者禁止重新注册账号,并及时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报告。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履行“制定平台规则,明确平台内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处理个人信息的规范和保护个人信息的义务”。

张新宝建议,具有直播功能的平台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制定平台规则,约束直播企业和个人的相关行为,同时,相关网络平台在接到投诉之后,应当及时处理。

在规范网络直播内容方面,王春晖认为,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建立直播内容审核平台。

李丹林同样认为,网络平台应该完善相应的管理机制,比如在服务条款、平台规则方面,如果直播内容涉嫌侵权或违法,平台应及时提醒或停播,或者可以通过相应的制约机制予以处理。若平台自身放任此类行为,监管部门则应当根据相关规定对平台进行处罚。

## 要拿起法律武器

## 叫停被侵权行为

“被拍摄者一旦发现对方未经许可对其进行直播,可以立即声明这是未经自己许可的行为,与此同时,还可以表示自己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如果被拍摄者事后才发现,则可以未经自己许可为由,请求平台屏蔽或删除直播留存。被拍摄者也可对拍摄者以侵犯其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等为由提起诉讼。”李丹林说。

李丹林分析说,如果内容已经直播出去,其中有涉及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等权利的侵犯内容,被拍摄者还可以提出相应的抗辩和辩解。由公开和传播相关信息的搭讪者、直播者承担责任。

李丹林认为,如果被拍摄者无法提出未经其许可的证据,也可要求直播者提供获得其许可的证据,若直播者不能提供,则说明直播者没有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的义务,推定其没有获得许可,平台应该删除或屏蔽可回放的直播。

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任何组织、个人有权对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向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收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举报人。

王春晖说,公众对处理结果不满意或投诉举报不畅的,也可向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投诉举报。

“受害人有权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违法直播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张新宝说。

## 逾七成基层医生不后悔职业选择

## 互联网培训新模式助力基层医生圆梦“健康守门人”



图为青海省囊谦县人民医院医生尼玛江才在在线培训过程中做笔记。  
江流 摄

□ 本报记者 张维

“加强县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最为关键。”这一观点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进展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再次被提及。

那些曾经选择扎根于偏远地区的基层医生们,是否后悔他们的选择?他们如今的情况又是如何?一份新近发布的《基层医生互联网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给出了答案。

《报告》显示,超过7成的基层医生不后悔当初的职业选择,但同时,不少医生也坦言,其所在的地区医疗仍面临一系列短板,其中,位居前四位的短板分别是“人才”“管理理念”“资金”和“硬件设施”。《报告》由阿里健康研究院发布。

## 热爱中期待提升

乡村医生承担着农村地区大部分医疗照护责任和公共卫生服务责任,是我国医疗卫生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力量。截至2020年底,我国有70多万名乡村医生坚守在一线,用专业和奉献守护着村民健康,成为广大农村居民的“健康守门人”。

《报告》的调研对象是阿里健康“医脉谷一起学”公益学习平台上的基层医生,其中就有很多甘愿奉献、默默守护村民健康的医生。“当初学医本来就是为帮助乡亲们的。”一位基层医生林洁说。

《报告》显示,对于家乡的热爱,位居在家乡执业的原因之首,位居其次的两个原因则分别是“离家近、方便”和“在家乡收入较高、有尊严”。

热爱中,也有困境。参加调研的基层医生中,仅有22.3%医生认为自己的专业技能“足以应对日常工作”,77.7%的医生认为自己的专业技能“勉强应对日常工作”或“不足以应对日常工作”。

很多接受调研的基层医生也坦言,自己一方面对于提高专业技能有渴求,但另一方面,提高专业能力的渠道仍显不足。调研中,“业务培训”仍被基层医生认为是日常提高专业技能的主要方式,而近7成基层医生认为“缺乏培训机会”是自己工作中面临的主要困境,位列其后的困境依次是“待遇差”“患者多、工作压力大”和“上升机会少”。

事实上,这类问题已受到顶层设计的重视。2021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就专门提到: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乡村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支持县乡村医疗卫生人员参加

培训、进修,建立县乡村上下贯通的职业发展机制,对在乡村工作的医疗卫生人员实行优惠待遇,鼓励医学院校毕业生到乡村工作,支持医师到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开办乡村诊所,普及医疗卫生知识,提高乡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的《“千县工程”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方案(2021—2025年)》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人才队伍,加大对重点领域、紧缺专业、关键岗位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进修、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 搭平台授人以渔

在医疗人才能力的提升上,互联网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传统的业务培训多在线下,这种培训形式对于基层医生,尤其是偏远地区基层医生来说并非易事,《报告》显示,基层医生认为参加线下培训的四大障碍依次是“路途遥远”“成本高昂”“新冠疫情”和“耽误家中事务”。

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外科医生郭毅对此有深切的感受。2020年9月,郭毅跟随一支医疗队到四川甘孜扶贫——为当地基层医院医生进行培训,并参与义诊。“我们那次共去了四天,有两天花在了路上,再加上要克服生理上的高原反应,真正能够在当地工作的时间只有大半天。”郭毅说。

尽管这一趟行程异常颠簸和劳累,但当地基层医生对于提升自身医疗水平的迫切,还是给郭毅和同行的医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交流中很多基层同行告诉我们,他们面临着一种困境。”郭毅说,“外出参与培训学习,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和金钱成本,这对于偏远地区的基层医院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是否有一种更有效、成本更低的培训和沟通方式,让那些愿意分享自身经验的医生与基层医生实现更加便捷连接?

2020年秋季,阿里健康与中国志愿医生正式联手,作为一家爱心医生组织,中国志愿医生原本是通过线下医疗队的形式,带三甲医院的医生到各地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培训。如今,这两方要探索建立一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数字化基层医生培训平台:阿里健康负责搭建线上培训平台,中国志愿医生负责选派专业医师,定期给基层医疗机构医生进行在线培训。

在郭毅看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搭好这个培训平台,帮助基层提高医疗水平,也就是帮助基层

大连“11·03”疫情发生后,大连市税务局再次对全市冷链(仓储物流)业、水产品加工业和水产品贸易业前10个月的相关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并结合往年数据形成内容更加完备的分析报告,靶向性提出了完善疫情防控方法,坚定发展信心,鼓励企业开拓创新,恢复国内消费者信心等建议,得到好评。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一篇篇税收分析报告直达各级党政领导案头,在及时全面客观的税收大数据海洋中寻找帮助企业减负前行的“密码”。

2021年7月下旬,江苏省局部疫情暴发,江苏省税务局迅速与省防疫办等部门联合分析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第一时间完成全省及南京、扬州疫情分析报告,疫情发生后,税务部门再次撰写《从税收数据看去年以来疫情影响及恢复情况》,提出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建议,比如瞄准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完善制度性政策供给;统筹做好今明两年的宏观政策衔接,加强政策的跨周期调节等。

记者了解到,税务部门力争经过5年左右努力,基本建成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力的智慧税务,实现从经验式执法向科学精确执法转变,从无差别服务向精细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转变,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分类精准监管转变,全方位提高税务执法、服务、监管能力,更好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同时,将更加精准对接纳税人需求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把税收大数据的“金山银山”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动力。

也正是这一平台上,郭毅认识了一位名叫阿旺巴久的藏族基层医生。“郭毅老师是神经外科领域的专家,培训中,他结合实例的讲解,解答了我们很多疑问。”阿旺巴久回忆说。

阿旺巴久所在的囊谦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接待了一位脑出血病人,患者病情危重,甚至出现了深度昏迷和高烧不退等症状,让一众医生束手无策。紧急之下,阿旺巴久想起了郭毅,并尝试着通过上述平台联系上了郭毅。了解到病情,郭毅在线指导阿旺巴久等进行紧急施救,两地医生的联手,最终实现了病人的转危为安。

之后,阿旺巴久给郭毅手写感谢信,阿旺用藏语写道:“嘎真切”,意为感谢。

据了解,囊谦县人民医院位于青海省南部,属高原地区。医院现有68位医生,辐射周边200公里的百姓,年门诊量约达10万次,然而,由于基础教育的缺失,医生整体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多在大专水平。因此,加强医护的专业技能,提高规范化诊疗能力成医院重中之重。

其实,各界对于西部高原地区的医疗支援一直在不间断进行着,但限于交通、海拔等因素,无论是外部医院的医生“走进来”,还是当地的医疗人员“走出去”,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时间成本,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医疗机构业务能力的提升。

## 打造医疗顾问团

互联网被越来越多的基层医生寄予厚望。《报告》称,接受本次调研的基层医生中,67.2%的医生认为通过互联网培训对提升自身业务能力有帮助。接受调研的医生表示,希望现有互联网培训能在“专科疾病的诊断与筛查”“重症患者的有效救助”“常见疾病规范化用药”等方面有所助益。

一些互联网企业正在与他们相向而行。例如,阿里健康公益联合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县域医院院长联盟、凌峰公益基金会等公益爱心组织一起开展基层医生培训公益项目,旨在帮助提升县域医院实施临床能力,从而提升对广大基层老百姓的健康服务水平。

据统计,截至2021年9月30日,上述项目已经覆盖了青海玉树州、四川阿坝州、陕西渭南、甘肃礼县、河北巨鹿等300个县医院的5,000多名基层医生,累计学习时长35万小时。

此举旨在通过数字化医疗扶贫新模式,为西部偏远地区医疗机构打造一支永不撤离的医疗“顾问团”。以青海省囊谦县为例,阿里健康联合医生组织下基层线下扶贫义诊并调研,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发现除了一些高原病,当地的主要需求在于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水平的提高,在充分了解情况下,依托阿里健康的数字化能力,制定个性化的帮扶计划。

“在囊谦县时,县人民医院俄才仁院长一下子给我们列出了50多种常见病的培训需求清单。”中国志愿医生发起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峰说,“俄院长提高当地医疗水平的热切期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此,在前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依托阿里健康的数字化能力搭建在线平台,由中国志愿医生等机构每周选派一名专业医师,以一种疾病为主题,对囊谦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在线培训。

通过“互联网+医疗”的培训学习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外界影响因素,促使教学更便捷,有利于建立长效机制。在凌峰看来,“通过互联网提高基层医生的业务水平,从而改善我国医疗水平不均衡的现状,将被证明是作为线下扶贫的有益补充和重要方向。”